

李北东 / 著

# 中国 1956~1976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  
哲学探索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 中国1956~1976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哲学探索

---

李北东 / 著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 1956~1976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哲学探索 / 李北东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4. 8  
ISBN 7-80659-622-4

I. 中... II. 李...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1956~1976②哲学—研究—中国—1956~1976  
IV. ①D616②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790 号

中国 1956~1976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哲学探索 李北东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李 蓓                                                        |
| 封面设计 | 何东琳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br>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br>总编室电话: (028)86656816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br>发行科电话: (028)86662019 86658275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028)87427333                                     |
| 版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10.125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7-80659-622-4 / C·2                                   |
| 定 价  | 16.00 元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步伐前进 (代序)

李声禄

——中国1956—1976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哲学探索

恩格斯有句名言：“任何科学本质上都是历史科学。”1956年至1976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间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的哲学发展问题，我们既不能漠视和否定，也不能盲目颂扬和迷信，而应当认真地反思、总结和研究。对这一段哲学思想的研究应属哲学思想断代史的研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居这一阶段的主导地位，研究这一阶段的哲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期间的哲学思想。我有幸事先接触到四川师范大学李



北东教授的新作《中国 1956~1976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哲学探索》，并嘱为该书作序。在阅读这一新作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联想，连同一些不成熟的认识，录下作为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哲学界的同仁们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出版了不少力作。如黄楠森总主编、宋一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庄福龄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雍涛著的《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及全过程都作了很好的研究。又如许全兴等著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冉昌光著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郭涛著的《毛泽东的探索——中国的 1956~1976》等，就是对毛泽东的断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现在又出版了李北东教授的新作，成了这个家族中的新成员，该书的出版，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哲学问题研究和思考而言，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步伐。在该书出版时，我国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多说几句，以作引玉之砖。

## 一、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同命运的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前进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随之深入、前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逐步深入、丰富和发展。回顾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二十年的历史，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都



是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相连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都是紧扣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步伐前进的。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每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重大关头，对每个重大问题的思考，都在哲学问题上得到了反响和表现，其正确和错误，既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又使哲学受到深刻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形势和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任务，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教育，使干部群众树立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投身到创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去。哲学与新中国共命运，掀开了中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展开，中国的社会制度快速变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显现出来，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重新审订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随后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矛盾论》《实践论》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作了哲学上的科学论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服务，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实应用开辟



了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作，是中国共产党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成为改革的先声和开放的前导，成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先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创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毛泽东在这一学说中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这一矛盾还会引发其他各种矛盾的发生和发展，解决这一矛盾是解决其他矛盾的根本。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探索的重大贡献，这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推出了六条标准作为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当然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只提这六条抽象的政治标准是不够的，若不从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上制定区分的标准，就缺少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把握的政策界限，这些标准就有被随意解释的可能，后来造成大量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便证实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毛泽东还阐明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并由此提出了正

---

\* 本书中“苏联”一词，皆指“前苏联”。



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做法。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应该创造主观和客观条件，使矛盾向着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创举，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列宁早逝，他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来得及具体研究更说不上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长期否认社会主义有矛盾，当矛盾暴露后又处置不当，从而违背了这一理论。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使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思想和原则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发生了“左”的错误，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它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共兴衰的。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提出了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毛泽东提出，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我们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我们在建设中要少犯错误，所犯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必须懂得，经济建设是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全党来说，知识是非常不够的，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要解决



这一矛盾，只有在实践中努力学习，下苦功去调查它，研究它，从而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用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的经验告诉全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达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认识和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入手。认识和掌握规律的过程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必然反映。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繁荣哲学学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同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推进，社会制度快速变化，各方面的矛盾在新的条件下突现出来，而且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重新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推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新著，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用讨论和辩论的方式来加深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围绕上述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在哲学方面展开了“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关于综合经济与单一经济基础”和“关于两类矛盾”、“矛盾同一性与



斗争性”等哲学基础理论的讨论，随之又开展了逻辑学、哲学史、美学以及生物遗传学中的哲学问题等等领域中许多重要哲学学术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围绕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进行的，都力图从根本上回答所探索问题的理论基础，要求人们面对现实，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历史证明，这一时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与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哲学学术问题的繁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党内“左”的思想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不断展开，哲学领域也未幸免于难。特别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了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了矛盾调和论等等。杨献珍也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而撤销了他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许多持有与他相同学术观点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被视作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把许多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而且把学术上的讨论和批评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一些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同志进行了政治围攻。而且以学术观

点定罪，错误地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党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这种批判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党的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伤害了知识分子，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历史证明，在哲学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与讨论中，哲学的前进与发展、深入与曲折，都是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与曲折相一致的，两者是共命运的。

## 二、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它又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曾将哲学同无产阶级关系比作是“头脑”和“心脏”、“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并且断言“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消灭自己”，从而获得彻底的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精神武器”去武装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才能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时，就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



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①</sup>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大力提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将哲学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都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开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历史表明，新中国哲学的普及、哲学思想的活跃，往往是社会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的标志，健康的群众学习哲学运动和哲学思想繁荣，深刻有力地促进着历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学哲学、普及哲学的各个阶段，都同社会主义事业并行前进，都刻印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深烙印。如前面已指出的，建国初期干部群众对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学习，使人们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新社会，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1958年开始的群众学习哲学运动，群众将学习的哲学知识同生产、技术革新的实际结合起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造了旧的技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结下了丰硕之果。1962年到“文革”前，群众将哲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学知识与三大革命实践，重点是阶级斗争实践联系起来，虽有成效，但更多的是教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前进步伐停顿下来。1966 年开始的“文革”十年，给哲学带来了“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混乱局面，给党、国家、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群众学哲学的活动经历了复苏和兴旺，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将之应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去，而且更侧重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坚定地走上了健康正确的轨道。

人民群众学哲学的作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马克思说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在群众学哲学的运动中，一开始就把学习重点放在学好《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哲学著作上。这两篇哲学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也是人民群众登上哲学殿堂的启蒙之作。通过学习，重点掌握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及“两点论”和“主观能动性”等哲学原理。他们把学到的哲学原理同生产实际、技术革新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他们在布置生产和工作任务时，用哲学原理分析完成任务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保证完成任务；在生产和工作的进程中，用主要矛盾理论去分析，抓住“牛鼻子”，带动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在总结生产和工作时，用“一分为二”作深入剖析，克服故步自封

的思想,继续前进;在学习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时,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既学习先进,又不照搬照套;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用哲学原理阐述和分析政策的基本精神及要求,借以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人民群众的这些作法和经验,有助于加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群众学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哲学解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途径。在群众中普及哲学,对于冲破传统的“书斋哲学”的影响,对于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中解放出来,起到了“催化剂”和“示范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人民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活生生的哲学,是解放了的哲学,因此,哲学的发展必须面向大众、面向实际。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曾经指出:“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sup>①</sup>他还说:“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际脱节。”<sup>②</sup>因此,这条道路只能使哲学走向死胡同。让人联想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我国曾经出现过毛泽东只有《矛盾论》《实践论》等小册子,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改革开放后又曾出现过邓小平著作是一些政策文献,有没有邓小平哲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学思想的议论。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原因很多，但囿于对书斋哲学的认定和推崇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出发，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旅途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1956~1976年间，中国群众学习哲学的活动，经历了各种情形，而群众在学习中对这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正确选择并用实际行动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使中国当代哲学沿着哲学解放的正确道路稳步前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科学的作法和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条正确途径。

当然，人民群众在学哲学的活动中，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学习还不够系统和深入，特别是在其间还出现一些“庸俗化”、“简单化”和“贴标签”的现象，尤其林彪鼓吹的“立竿见影”，使群众学哲学的活动走了一些弯路，甚至被引入歧途。这主要是由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工作失误造成的，不应归咎于学习活动本身和人民群众。总之，在群众学习、掌握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无论是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走过的弯路和偏差，都是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加强对群众学哲学的领导，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和现代化生产的进行，经济管理就成为重要的问题。经济管理是现代

化生产的必然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构建新的管理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崭新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提供了许多以民主性、人民性为特征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哲学的雏形。这是我国人民群众与哲学密切相连的又一个内容。本书专章阐述这一时期的管理哲学思想的尝试，成为该书最鲜明的特点。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群众创造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如鞍钢宪法、大庆经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对当时和后来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显示了人民群众无限的创造能力。建国后，我国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是毛泽东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各行各业的管理条例。前者属管理理念，是战略性的；后者是管理方法，是技术性的。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管理哲学雏形。

1960年初，中共鞍山市委总结鞍山钢铁厂的经验，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于当年3月22日对此报告作了批示，并且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号召全国一切大中企业、大中城市都要学习鞍钢这一经验。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基本精神是：在社会主义企业



中，工人、技术管理人员、干部都是企业的主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密切与工人的关系，不搞特殊化；对于搞好企业管理，对于熟悉生产都是很重要的，而工人参加管理，则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民主。规章制度是因现代生产的发展而设置并为其服务的，随着工厂企业生产的不断发展，那些不适应现代管理的陈规旧章要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三结合则是要求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都要贯彻群众路线，发挥各自的长处，密切领导、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解决多方面的矛盾。这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正确原则，对办好社会主义工厂企业是长期适用的。

1957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他指出，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有效方法，应该充分应用和全面推广。1958年的“大跃进”给社会主义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在企业生产、经营、分配、管理等各环节都严重失控。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要把企业管理上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指出，工矿企业在生产方面要加强经营管理、经济核算和责任制；在规章制度方面，不能统统否定规章制度，“大跃进”以前的许多好的东西应当恢复起来，特别在大生产里边的系列问题，更要有充分的科学根据，不能随便乱动。邓小平的这些管理思想，在后来制定的

